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99  
25 March 1976

CHINESE

第一八九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四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布瓦雅先生

(贝宁)

理事国: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泽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森德贝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五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最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 S/12017 )

主席：按照第一八九三次会议的决定，我现在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根据以前会议的决定，我也请孟加拉国、埃及、印度、伊拉克、约旦、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一般的了解，在轮到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孟加拉国代表凯泽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伊拉克代表扎哈维埃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得里奇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几位在这里的代表好象有了若干的错误观点，为了指正这些错误观点，我觉得我非再发言不可。此外，为了避免要我再一次发言我将抓住这个机会解释清楚我昨天发言的一部分；该部分发言刊印在第 S/PV. 1897 号文件英文本第 101 和 102 页，因为提到它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联合王国同事理查德先生。

有人告诉我，我对犹太人有一点过分苛刻。我的回答是：我从没有苛刻对待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的，但不是对犹太人。我们有这样一句阿拉伯谚语，“避开邪恶，高声歌唱”。我为什么要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寻衅呢？问题是从一九二二年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一直没有让我们好好过日子。

其实，要不是一九四七年的划分巴勒斯坦计划，我早就已经离开了联合国。不是别人，而是已故的费萨尔王陛下——愿他的灵魂安息吧，他叫我组织一个代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团。我的确希望做别的事情，因为当时我怕联合国在重蹈国联的覆辙。在旧金山审议和签订《宪章》时所发生的事情我都看到。

当时，已故的费萨尔王陛下是我国的外交大臣。在大战结束前，已故的邱吉尔先生——愿上帝原谅他并怜悯他的灵魂——的政府邀请我们到联合王国去。但我们发现，我们的英国朋友已不能再忍受鲜血、汗水和眼泪——邱吉尔先生的名言——当我们抵达英国本土时，工党政府首脑艾特利先生派了一位代表欢迎我们。这都发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当我们在海上的时候——我们在玛丽皇后轮上；它当时仍是一艘运兵船，但因为战争已接近尾声，所以人不多——我们看到一则电讯，报导美国总统，即已故的杜鲁门先生——也愿上帝宽恕他并让其灵魂安息吧——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这一切同在审议中的项目有什么关联呢？我继续讲下去就会非常明显。

英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为了把世界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

来，而且还是，据说，为了把世界从外国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但要是没有希特勒——我并不是在为希特勒辩护——欧洲的海外帝国将保存到现在。

把一堆史事收集起来不是历史；那是编史工作。由依本—哈敦这样的人所写的是历史。依本—哈敦是一个生活在几百年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出生于突尼斯，去了摩洛哥，在埃及住了一段时期。真正的历史是由好象斯彭格勒和阿诺德·托因比这样的人所写的东西。什么因素决定历史的进程？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冲突涉及那些政治势力？这才是历史。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历史，而不是什么按年代记载的大事和日期，等等。

我从前可能已经讲过这一点，但还是值得重复一遍：二次大战时，盟国之间都是尔诈我虞。要证实这一点，只需看一本在几个月前出版的书：由小查尔斯·米写的《聚会于波茨坦》。当邱吉尔先生和杜鲁门先生同已故的斯太林先生——虽然他是共产分子，但也愿上帝安息其灵魂——讨论和平的条件时，邱吉尔先生转向杜鲁门先生，说：“那 700,000 在英国战区放下了武器的纳粹部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不直捣莫斯科，把俄国人干掉？德国人发动了它，让我们结束它吧”。好象俄国人是塘心旦一样。

杜鲁门先生挺起胸膛，说：“我有更好的东西；我有原子弹”——当时国防部长斯廷普森先生正在恳求杜鲁门先生不要用原子弹，因为它有一天会导致这个世界的末日。

我从过去出席安理会会议的亚力山大·卡多根爵士那处知道若干事情，但这都不如那位美国研究者小查尔斯·米所列举的事实明确。俄国人——或者苏联人——可以证实我这一点：当时日本人正通过苏联驻东京的大使进行接触，要求知道他们可以怎样取得和平。但杜鲁门先生仍然希望投下原子弹。这是多么沉痛的悲剧，到现在还是一样——因为每个人都企图获得原子弹。

现在，我要再推前几年。当我们的英国朋友觉得有必要由邱吉尔先生重任首相的时候，英帝国已在崩溃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快得到自由，随后，我们又为那些

现在坐在会议席周围的非洲“狮子”加入战斗，在道义上支持他们。所有那些在英帝国里的美丽的“鸟”都从“笼中”飞出来。邱吉尔先生说：“我之被任命为陛下的首相，不是要来负责安排大英帝国的破产。”在这个背景之下，我将谈及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一直纠缠着我们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的专家求见杜鲁门先生，因为中东有美国的朋友，新闻界和外交界所指的朋友；换句话说，美国从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得到若干的利益，沃兹沃思先生代表他们发言——我认识沃兹沃思先生；他是个好人，不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出身良好的人，正如同斯克兰顿先生你一样——但杜鲁门先生问道：“告诉我：我的选民中有多少是原籍阿拉伯或黎巴嫩的美国人？”

换句话说，他站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边，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势力大；他们充斥了这个国家，东道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兴旺起来，在这里，如果他们兴旺起来，犹太人的权力就更大。但是，他们用他们的权力对阿拉伯人称王称霸，把巴勒斯坦人逐出他们自己的家园。我不用一次又一次地再三反复告诉你们他们的祖先从来没有见过巴勒斯坦。

有些人同我争辩，说我歪曲了历史，并且可能伪造了历史。说这话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我的朋友理查德先生。“伪造”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应该用的词。如果理查德先生是说我搞错了或者说我曲解了历史，那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但控告我伪造历史？我是什么人：一个伪造者？我没料到理查德先生会说我伪造了若干历史事件。我刚从新闻稿获悉：

“联合王国的艾弗·理查德说，昨天，沙特阿拉伯代表伪造了若干历史事件。”

“伪造”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词。“伪造”这个词有意图的含义，他可以说我弄错了，或是误解了。我历来都是这样说：我会犯错误，我愿接受指正。但“伪造”？

因此，我发言澄清事实时，我希望托马斯先生会留心倾听我的发言，把我所说的东西转告我们的朋友理查德先生。

我不明白为什么英国人虽然已经替犹太复国主义者做了这么多“好事”，但他们总是怕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够保护自己而在这里替他们辩护起来。他同我辩论的，是载在昨天下午会议的会议记录英文本第 101 和 102 页里我所讲的东西。我提到三样东西：达考、《安·弗兰克的日记》和垮了台的帝国——包括往昔的帝国，指罗马、阿拉伯和拜占庭等帝国，也包括近代的帝国。这好象使我的朋友理查德先生的神经紧张起来。我看他总是冷静而镇定，是一个中流砥柱的人物，当他坐在那张椅子上的时候；但他生气了，所以我拿了记录，找找看什么东西使他恼怒起来。下面就是我讲的东西：

“但愿那些支持以色列的人当心，如果他们不主持正义，他们就不可能维持他们的力量和权力。往昔的帝国那里去了？垮台了！现在的帝国也一样。

我不想指名直说，使事态变得更糟。”（第一八九七次会议，英文本第 101 页）这是英文本第 101 页的一部分。

这是伪造的吗？不是事实吗？

“但是，老天爷，是殖民主义者吧？同哈扎尔斯相比，那些殖民主义者还算是好的。就这一方面来说，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都没有没收当地人民的财产。当然，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殖民主义找理由；有一阵子他们把殖民主义称作‘白人的负担’。”（同上）

请看拉迪亚德·基普林的作品和基普林时代的文学作品。当时，英国人有一项天职。但他们现在有一个工党政府，我看我没有搞错，而且他们因为没有殖民地而比前快乐。

你们去“教化”全世界。当然你们要找理由，让自己在别人的国家停下来。你们就称他作“白人的负担”。

跟着：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如何能把他们的殖民主义说成有理呢？‘上帝把巴勒斯坦给了我们。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而你们世界各地的人民就活该倒霉。你们是后来者，因为我们才是上帝的选民。’一派胡言，真是荒唐。”

(同上)

这没有任何特别触犯英国的地方。

下面可能是使他感到恼怒的地方——我要看看是不是。我随着说：

“他们〔指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要激起欧洲人的感情，欺骗他们”——我没有说犹太人欺骗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犹太人在有一个国家之前，也就是说在以色列还未建立之前，就已经要西德偿付了数十亿万美元。罗斯福夫人曾向我介绍一本书，说：“你要读这本书，真是非常使人感动。”同其他人一样，我读了那本书后，很受感动。那本书就是《安·弗兰克的日记》安·弗兰克是一个住在荷兰的犹太家庭的女儿。她、她的父母、哥哥和姐姐都被德国人拘禁。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书中百分之九十的所谓对话都是由一个莱文先生所撰写的。”(同上)

我这里有这个消息的英国来源。这是由理查德·哈伍德先生撰写的。他是一个作家，并且是二次大战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专家。他目前在伦敦大学。我觉得伦敦大学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哈伍德先生之所以搞战争罪这个使人伤脑筋的课题，是受了保罗·拉斯西尼埃教授——一个法国作家——的影响。这本小册子从拉斯西尼埃教授的巨著中得到不少的帮助。作者现在在搞这套关于一九四五到一九五六年纽伦堡大审判的丛书其中的一集。

既然我的联合王国好朋友现在知道消息的来源——一个英国的消息来源，我就讲明我所指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本最近出版的书。我希望我的瑞典同事听听下面的东西。书里面说：

“瑞典的《自由言论报》于一九五九年首先揭露关于安·弗兰克日记的真相。该报证实犹太小说作家迈耶·莱文是“日记”对话的作者，他已采取法

律行动，要求奥托·弗兰克〔奥克·弗兰克是安的父亲〕偿付作品的酬金。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美国的《经济理事会通讯》载有这篇瑞典文章的压缩：

‘西方国家通过《安·弗兰克的日记》这本声称是由一个犹太少女自己写的日记认识这个犹太少女已有多年时间。任何对文学有心得的人在翻阅过这本书后都会认为这不可能是一个十几岁少年的作品。

‘纽约高等法院在一項值得注意的判决中证实了这个观点。法院判定安·弗兰克的父亲须付给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迈耶·莱文 50,000 美元，以酬谢莱文在《安·弗兰克日记》中的创作。

‘在瑞士的弗兰克先生答允……最少付给迈耶·莱文 50,000 美元，因为他一字不漏地把作家莱文的对话当作是他女儿的作品“移植”到日记里去。’

“进一步的调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从一家纽约律师事务所得到如下的答复：

“我是在迈耶·莱文对奥托·弗兰克对其他人的诉讼中代表迈耶·莱文的律师。陪审团确是如你来信指出，裁决莱文先生应得到 50,000 美元的损害赔偿金。后来，主审法官塞缪尔·科尔曼阁下基于损害未经依法证明而驳回裁决。诉讼后来在对科尔曼法官的判决提起上诉前得到解决。

“我恐怕这桩案件，就审讯过程本身来说，甚至连科尔曼法官的判决来说，都没有正式的报告。若干程序事项——我的好朋友托马斯先生请把下面的东西记下来交给理查德大使——在纽约补编第 141 号，第二辑 170 及第 5 号第二辑 181 留有记录纽约县秘书处的正确档案编号是 2241-1956 号，该档案可能很长很详尽……！”

假如我的看法不正确，理查德先生可在说我伪造以前先问我：“你的事实那里来的？”也许他对这个作者有所认识，可以告诉我“唉，他是个骗人的作家”。

但说我“伪造”、巴鲁迪伪造？啧，啧。

第一八九七次会议逐字记录英文本第102页有一处提到达考。我有其他的消息来源，其中一些是美国历史学家的，但我不想过分烦扰安理会。

现在，我引用一篇关于奥斯威辛的目击报导：

“克里斯托弗森的报导可以肯定是在重新评价奥斯威辛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一九四四年整年他都在奥斯威辛，并且探访了所有组成奥斯威辛这个大组合的各个集中营，包括据说发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事件的奥斯威辛—比克瑙营。但是，克里斯托弗森却肯定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写道：‘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都在奥斯威辛。’〔这是差不多整一年的时间。〕‘战后，我听到据说是黑衫队干的，大规模谋杀犹太犯人的事。我对此完全感到惊讶。尽管有着所有的证人为证，各种的新闻报导和电台广播，我直到今天仍是不相信这些可怕的行为。我曾经在许多地方讲了许多次这些话，但都没有用。一个人总是没有人相信。’”

然后，他又用其他的消息来源，从书本中引用关于用毒气杀人的报导：

“但是，从来都没有人找到一个活着的、可靠的，并得到证实的，曾经目击“用毒气杀人”的证人。在集中营住过七年，包括三年在奥斯威辛的贝内迪克特·考茨基在他撰写的《Teufel und Verdammte》（《魔鬼与入地狱者》，苏黎世，1946）一书中称说‘最少有350万犹太人’在那里被杀害。这句话确是奇怪的，因为他自己承认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死刑毒气室。他供认‘虽然我身处于该巨大的德国集中营，但我必须确定一项事实，即无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集中营我都没有碰见死刑毒气室这样的设施’……他唯一举眼见到被处决的，是两个因杀害两个犹太同狱犯人而被处决的波兰同狱犯人。考茨基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从布痕瓦尔德被遣送到奥斯威辛—布纳去劳动。他在书中强调，直至战争结束为止，集中营政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利用犯人于军事工业。这一点和所谓屠杀犹太人政策使他不能自圆其说。”

我不相信犹太人没有遭处决。我凭什么可以说他们没有遭处决呢？犹太人好，非犹太人亦好，任何人被处死，不管是被毒气毒死，被军刀杀死或被炸弹炸死，我都觉得很难过。“死亡的原因多不胜数，但死亡只有一次。”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罪行。但是，在答辯赫佐格先生时——他又缺席啦，我想这是因为他对这个课题非常敏感，要不然就是他不喜欢听见我这使他耳鼓感到难受的声音——我主要是驳斥对阿拉伯人的种种胡言和中伤。我是在告诉他，许多历史，不是往昔的神话和故事，都被歪曲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犹太人利用他们常常提到的600万犹太人这个数字。有一次，特科阿先生坐在我旁边，我说，“为什么你说625万或520万？为什么总是600万，好象你有真正统计数字一样？”这个数字不是真的，并且总会水落石出，正如从前发觉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入侵比利时时并没有吃婴孩一样。第一次大战后，英国外交大臣在议会上向德国人道歉，这就是英国人伟大的地方。但除了巴鲁迪外还有谁敢指出这些东西呢？他们叫他作反闪米特者。这是自相矛盾的，一个闪米特人变成一个反闪米特者——巴鲁迪反对自己。这好笑吗？“伪造”——多么可耻的词！

我不要求道歉，但我能驳斥说过的东西。我们是外交家；我们会犯错误。但我认为他说我伪造若干历史事件是不合理的。如果我真的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那也只是代别人做的，因为我引用的是英国资料。

在我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要向我的联合王国同事保证，我仍然是英国人的朋友。我和他们的个人关系或外交关系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受毁损。但我们不应动作机械化，拘泥形式，搞从前那套咬文嚼字，玩弄语义的外交家时尚游戏。让我们开诚布公吧。让我们以新的方法处理国际事务吧。这是行动的时刻了。当前，大国一边甜言蜜语，一边堆存武器以备杀尽之用。他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我们受骗了吗？没有，先生。

虽然我已经七十岁，但我希望年青人会采取新的方法，不再以诽谤中伤、旁敲侧击和兜圈子等古老方法处理国际事务。如果他们要兜圈子，不愿意来这里讨论

生死攸关的问题，讨论一个事关由自己家园遭驱逐出来的民族的自决问题，那就让他们到马戏场表演转圈吧。他们不能用一把码尺来量度欧洲人，用另一把来量度亚洲人和非洲人。我们都是人，肤色不同的兄弟。但如果他们要自高自大；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手法击倒他们。他们是什么人？竟然企图以强权手段来克制较弱的民族。他们内部已蕴藏了灭亡的因素，并且将同其他的一样，趋向没落而至垮台。叫他们小心吧。

我很抱歉我的发言这么长，我知道各理事国都很希望了结这件事，然后，可能在下星期，开始讨论另一个我要发表意见的棘手问题——安哥拉及其他事项。我们将看看欧洲人偷偷摸摸在暗中干什么勾当。我希望到时将没有中伤的行动，大家能善意地进行讨论，以期带来和平，包括居住在巴勒斯坦圣地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因为如果不建立和平，我们可能使世界走向地狱，陷入极度的痛苦，遭受各种的苦难，甚至导致人类的灭绝。这是不能逃避的事实。

主席：由于没有其他安理会理事国愿意在一般性辩论的这个阶段发言，现在安理会就要结束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工作，我要以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身份说几句话。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见到新任的美国常驻代表来到我们这儿，我们为他职务的成功致以最好的祝愿。我可以立即向他保证我们的充分合作。

我国代表团也很高兴见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和以色列代表都来参加我们的辩论。我相信这两个代表团对我们的工作作出的贡献将会帮助中东局势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贝宁很乐意把他们参与我们的辩论看做是一个好的征兆，这表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最后同意一起坐下来谈判，共同谋求方法和途径来制止那个骚乱地区将来再发生流血事件，已为期不远。

贝宁代表团很留心地倾听与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紧张局势问题主要有关的各代表团的发言，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若干年来我们所持的立场已证明是合理的。亵渎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圣地的问题和以色列想要转变它目前统治领土上的人口、政治和社会特性的显著趋向，都表明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必须撤出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个事实已经在大会决议和安全理事会有关中东的一般性问题的决议中再三强调过。

很清楚地，任何占领情况如果不是适时而止的话，最后总会激怒当地居民，引起占领军通常无法控制的反叛反应。以色列要能够对这些情况作出适当反应，就必须承认这些明确的事实与真相。这种令阿拉伯人如此深恶痛绝并为国际社会如此强烈谴责的占领，必须停止，不能再无谓地耽搁下去，因为耽搁下去无可避免地是对以色列有害的。这是为什么安理会必须马不停蹄地设法使以色列尽快撤出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如果这个国家真的希望保证其自身安全并与其邻国和平谅解地相处的话。

安理会的职责是要向大国呼吁，特别是那些能够对以色列有任何影响力的大国，这样以色列才会认清这个真理而服从这些历时太长因而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的历史教训。如果以色列撤出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话，安理会面对的这个由于不合时代的反常状况而引起的问题也就会消失。我们只希望以色列和阿拉伯，特别是巴勒斯坦人之间不久会开始认真谈判，这样他们可以找到一个让以色列撤出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减少中东紧张的解决方法。

现在我要请巴基斯坦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很荣幸能够代表贵国，圭亚那、巴拿马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我国代表团向安理会提出载于S/12022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是毋须解释的。各理事国都知道准备这个草案花了多少工夫。可是我要请求你特许我简略地解释一下向安理会提出这个草案的提案国的想法。

目前关于造成中东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分歧的问题和情绪的辩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此次辩论已反映出这个历时已久的冲突所引起的忿怒与苦痛。正如经常所发生的一样，大家说过的话并非句句都是必要而相关的。辩论开始时我曾在我的发言中说过，我要再说一次，本次会议的目标是很明确的，该目标已在我国和利比亚代表团联名给阁下的信中详细说明了。

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一带发生的事件是表示时间紧迫的警告信号。有人说以色列的军事占领是温和而可作榜样的。但事实上军事占领在其性质上，是不可能温和的。只要反抗占领的行动一旦出现，温和的面貌就会消失，武力威胁又再出现。譬如今天早上的《纽约时报》就说：

“以色列现在更不犹豫使用武力来维持公共秩序。在镇压最近的叛乱时，以色列军人——许多是十几岁的少年——已经使用他们自己在其他场合都会谴责的策略”（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第三页）

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被占领土上的公正无私的观察员的报告已为我们描述了这个局势。城市一个接着一个都在实行宵禁，耶路撒冷的民房屋顶上都有伞兵。所有这些现象已经继续了七个多星期而且日益严重。以色列最高法院所下的判决对局势无所改变。把个别的游击队行为说成是恐怖主义行为或强盗行为是可能的。但把我们在约旦河西岸所目睹的群众起义说成这样是不可能的。以色列代表要把大事化小，把整个事情说成是受外来宣传所鼓动的十几岁少年的示威行动。我要说这种自欺的行为是无效而有害的。

这儿发生的辩论至少表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非常明白局势的严重性——不仅是安理会理事国，整个世界都明白。特伦斯·史密斯先生再度从耶路撒冷发出报导说：“这些骚乱是真正的当地发生的现象，反映出八年来占领统治下的居民积累的不满”（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关于和平的要素，整个世界也都清楚。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他们在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中所占领的全部领土。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他们成为统一体的权利，他们的自决权，他们选择回到他们离开或被迫逃离的家园的权利，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互相尊重、和平生活的权利，都必须受到承认。安理会将来着手处理这个更大的问题时，我们当再回到这上面来，我们将再度谋求达到从前未能达成的协议。关于目前议程项目的特点，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关纠正这个局势所必须作的事和从前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既没有大差别，甚至我可以说连小差别也没有。我要冒昧地引用这儿的许多言论之一，我们的美国同事的发言。关于耶路撒冷问题，他重述了他的前任所说过的话，并且接下来说：

“美国不接受或承认该地区任何国家采取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片面行动。……这种片面措施，包括以色列政府征用土地或采取的其他行政措施在内，都只能看成是临时性的……”——我敢说这只能看成是非法的——“不得影响耶路撒冷目前的国际地位或损害到耶路撒冷最后的永久地位。”（第1896次会议，英文本第37页）

关于我们所关心的更广泛的问题，美国常驻代表说：

“……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使大批以色列平民在被占领土内，包括东耶路撒冷，定居下去，显然是非法的，……我国政府认为这些住区的出现对于为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达成公正永久和平而进行谈判的圆满成功是一个障碍。”

（同上，英文本第38—40页）

在这个情况下，安全理事会负有责任根据《宪章》采取干涉行动，这是错不了的，也是无可争议的。

我要代表本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说，我们并不是以舞文弄墨的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确实觉得必须清楚地阐明基本原则，但这个草案的基本目标，它的目的和推动力是比它的语言和措词更加重要的，序言部分指出，它的基本目标是要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表示关切，是要肯定基本的原则，譬如不能允许以武力和战争取得领土；执行部分内，呼吁以色列去作我们认为目前局势中最重要而从以色列本身和争端有关的其他各方希望谋求持久和平的长远观点看来，也是非作不可的事。我必须强调，所有争端有关各方第一次坐在这个议席上进行讨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向现实迈进了一步。

如果斯克兰顿大使原谅我的话，我想再回到他的发言上去。他说，他的政府对于向安理会提出的任何行动所持的立场，是由三个问题所决定。这三个问题是：

“第一，决议草案所根据的事实和判断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同上）

换句话说，以色列当局所采取的目的是要变更被占领土的物质、文化、人口和宗教特性，在被占领土成立以色列殖民区，以及违反人权的措施——随便你怎么称呼它们——应是安理会深切关心的事，这是否大致正确无误呢？

有人告诉我们，以色列对于回教徒和基督教徒尊敬坐落在耶路撒冷的圣地的宗教情感，最为谨慎留心。我不想在安理会长篇大论，让大家吃不消，但在面前有一篇戴维·赫斯特写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伦敦《卫报》上，

题目是“以推土机削平阿拉伯历史”，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他在文中说：

“在达扬发表了他的公告，”——表示以色列会尊重圣地的一份公告——“四天之后，以色列的推土机摧毁了代表回教七百年历史的‘寺产’或是连结着那堵墙——哭墙——的宗教产业。”“‘寺产’是由萨拉丁的儿子自己创立的；有六百五十个寺产基金受益人居住的马格雷布区的一百三十五栋房屋和两座清真寺都被铲除。”

这篇文章里还有更多的记载。

斯克兰顿大使的第二个问题是：

“……安理会的行动是否实际上将有助于增进对各该地区的适当管理？”（第1896次会议英文本第38—40页）

安理会能够作的是要提醒当事各方关于它们的责任、义务、任务以及他们在国际机构下的承诺，这是我们要设法去做的事。我们过去曾经这样作过，得到的结果是沉默和相应不理。我们至少可对以色列还没有

“……停止妄图改变耶路撒冷市的地位的行动和政策，也没有取消为达到这项意图而业已采取的措施；”（S/12022）

这个事实表示惋惜。

最后，美国常驻大使问道——他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也同意——

“安理会的行动将有助于或有碍于和平解决的进程？——安理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确立了这种进程的结构。”（第1896次会议英文本第38—40页）

五个提案国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我们向你们提出的决议草案如获通过，一定会帮助这个进程的发展，我们希望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有任何代表团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决议草案的通过将会阻碍和平解决的进程的话，我们很乐意知道它为什么会阻碍。

我说过我们不是要咬文嚼字。对于任何一个理事国觉得可能有必要或甚至为改进这个草案，即使不改进，也使它更易为大家接受的任何建设性观点或任何更改，我们过去曾考虑过，现在也仍愿考虑。

我想我们已提出了肯定的答复，而这个决议草案对斯克兰顿先生的三个问题也给予肯定的答案。它具体表现出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细节所能得到的最广大的协议。如果这个协议还不能达到一致通过决议草案所必要的程度，那就太可惜，太令人失望，而且也违反这个局势的政治逻辑。

我就此把这个决议草案提交给安理会的理事国，希望它会无异议地获得通过。

主席： 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向我们解释了这个决议草案。

在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我在安理会的首次发言中曾详细地说明了联合国在行动上已放弃自然法的原则。我指出，在这样的一种听询中，大公无私的观念已为另一种想法所取代，这种想法认为联合国机构可同时担任原告和法官。

有人就耶路撒冷内某些与阿萨克清真寺有关的所谓事件提出了控诉。我已经指出，这个指控只不过是谎言而已，它包藏祸心，阴险恶毒，企图煽动宗教骚动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我相信我至少已经使一些代表们相信，我们正讨论一个无意义的论点，这个论点在证据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也的确滑稽地浪费了各位代表的时间。整个辩论中最严重的事情当然是它背后那个危险和恶毒的阴谋，企图以下流的捏造来煽起全世界宗教舆论的愤恨。

有人企图要谴责以色列，但事实上，以色列政府却卫护穆斯林的权利，以色列最高法院曾两次维持了政府的决定。我相信我至少已经使我这里的一些同事们相信这一点。事实上，你们也许已注意到，这方面的指控已不声不响地在安理会的一些发言中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我们突然听到各种各样同刚才提出的指控毫不相干的事情，这些事情同当初那个使安理会仓促开会的控诉怎样也拉不上关系。这

种现象正是本组织的奥韦尔传统：以奥韦尔杜撰的语言辩论从不存在的事情，在这种命名为“新语言”的语言中，和平就是战争、爱就是恨、真理就是捏造。的确在这幢建筑物以外可能是一九七六年，但是，在建筑物以内却是一九八四年。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指控已经证明是捏造的各种次要的问题也都提出了，这只能证实我就这个毫无意义的文件的真正意图向安理会所作的解释，该文件当初提出是为了召开安理会议事的。

如果安理会真的遵照自然法的原则——这是安理会的当然指导——行事，它应怎么办呢？在这些情况下，提出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的人应当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不但把这个指控带到安理会浪费每一个人的时间，而且公然煽起种族和宗教的情绪，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平，在危机四伏的局势中到处煽风点火。如果一个大公无私的机构担任司法机关，不受行政部门的影响，不为权宜因素所左右，首先就一定会谴责这种卑鄙下流的行径，因为它企图在今天紧张的气氛中捏造事实、挑拨离间、鼓动宗教骚乱和制造破坏，处心积虑地要使局势恶化和导致悲剧。这个机构——如果它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司法机关，不受权宜因素的左右的话——跟着就一定会邀请冲突的当事各方根据安理会第338(1973)号决议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来解决这些危急的问题，而不是浪费安理会的时间。

但是，你们的做法又是怎样呢？我曾经指出在我有机会陈述我们的理由之前三天，在这里已成为常态的不合理作风之下，你们，甚至连那些比较明白事理的人在内，已经在裁判了，实际上，甚至在你们听到双方的理由以前，就在写判决书了——这就是那个决议草案的内容。我对于这种违反自然法则和破坏联合国的无耻行径表示抗议。我要声讨这种行径，希望开明的国际社会认识到在这个丑恶发展中的内在危机。用“红桃女皇”的说法……先判后审，你们又正在干这种事情。

联合国处理中东问题的态度是一件国际性的重大悲剧。它的影响是令人震惊和不幸的。联合国应作为一个讲坛，这个讲坛的目的是鼓励谈判，力求达成共同

意见和妥协，因为，中东问题只有在这种态度下才能加以解决。但是，联合国反而让自己受一小撮顽固极端分子的支配，这些极端分子的公开目标是反对任何寻求和平的行动，他们所助长的是分歧而不是协议，固执而不是妥协，狂热而不是忍让，冲突而不是和平。联合国在处理这个只能本着妥协精神才能解决的问题时，进行了我们不得不参与的这种讨论，充当了这些极端分子的急先锋，从而破坏寻求中东和平的种种努力。容忍这一小撮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支配联合国，就会延长中东冲突的悲剧。

我要最强烈地强调，不顾来龙去脉地讨论以色列管理下的领土绝对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做的人就是有意要歪曲事实的真相。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七年曾两次撤离这些领土，希望因此而鼓励我们的阿拉伯邻国采取和平的行动。当时，我们是得到国际承诺的。但是，当阿拉伯在一九六七年决定攻击我们时，什么诺言都忘得一干二净。在这里一再提到的一九六七年的疆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被置诸脑后。

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撤退、迁就和让步只能跟和平作交换。我们在一九六七年时不要战争。我们没有挑起敌对的行动。我们当时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疆界内。我们受到攻击，有人更誓言要消灭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同意再制造出产生上一次战争的局势，永远也不会作出任何妥协，除非用和平的行动来交换。我们已经为这种新的进展作好准备，以色列——埃及的西奈协议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曾经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疆界内已经有十九年了，现在这条疆界在大众眼中突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还可以解决中东一切丑恶的事情。难道，阿拉伯国家曾经要和平，或者甚至谈过和平吗？不，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发动战争。这场战争是他们存心有意发动的，记录具在，用他们当时的话，就是要把我们丢到海里去，男女老幼一并赶尽杀绝，战争的结果形成我们今天管理这些领土的局面。

尽管存在着各种问题，我们对于我们对这些领土的管理是感到自豪的。尽管遇到种种挑衅，我们连一次死刑都没判决，这是我们感到自豪的。就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而言，我们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自由，比中东任何其他阿拉伯人所得的更多，这也是我们感到自豪的。今天，在整个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民没有言论、写作和投票反对居住国政府的自由，现在，连黎巴嫩差不多也变成这个样子，对此，我表示遗憾。只有在以色列，阿拉伯人才有这样的自由。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西岸和加沙，我们每天都同人数众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打交道，我们自觉地要在阿拉伯地区建立一条桥梁，这条桥梁在最近几个星期内经受了骚乱的考验，这些骚乱是由那些不负责任的煽动造成的，很不幸，安理会这次会议也有一份。我们看一下今天中东的事件，盘算一下国内外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对它们的严重性给予适当的评估。

阿萨克的故事挑起了宗教情绪，引起西岸所发生的动乱，但是，这个故事是毫无根据的，以色列政府是卫护穆斯林利益的，事实上，在这次骚乱中，阿萨克清真寺的审判官和宗教领袖在安抚群众方面比任何人都强烈和积极，因此，情况才没有演变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这方面，一些显著的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这些事件发生时，通往约旦的桥仍然开放，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及其它人往来无阻，照旧进行贸易。七万名阿拉伯工人象平常一样到以色列来上班。枪械从来就不准使用。一名下班后的士兵曾开枪向人丛射击，不幸击中一名小孩，这名士兵已被拘捕和起诉。两天前我曾指出，在这段期间内，西岸被拘捕的人数总共不超过48人。

让我们正确地观察这个形势。尽管发生了骚动，但是阿拉伯人没有提出要撤消选举。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要这些选举，它们是会举行的。如果他们不要，那就随他们了。候选人将于本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下星期一，提出申请，选举则订于四月十二日举行。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一下这个被阿拉伯花言巧语所歪曲的局势的真相。记得

当我们聆听着这场漫无目的的辩论时，黎巴嫩昨天死亡的人数就超过200人，从我们辩论开始后算起，那里死亡的总数已几达480人了。悲剧正在黎巴嫩蔓延，安理会却保持缄默。黎巴嫩正在失火，安理会却继续在浪费时间。

我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和别处从未说过，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要回避面对我们的问题。事实具在，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国政府一再就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阐明了我们的政策。但是，请问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尊贵的代表们，你们岂能想象，不经谈判，当事各方之间就能解决问题吗？你们岂能想象，有关各方不经谈判就能决定任何人类的问题吗？你们岂能想象，我们在这个会议厅，或者这幢大楼的其它会议厅所听到的这种辩论会导致任何有结果的发展吗？你们是否真的相信，任何有自尊心的个人，更不用说有自尊心的国家，会甘心情愿地忍受象这样的恫吓，然后还作出让步，并且相信讲这些话的人吗？

两位阿拉伯代表昨天在安理会说要摧毁联合国一个会员国。

安理会这个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的机构的一名成员，利比亚的代表昨天在这里要求摧毁一个会员国。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规定：

“大会应选举联合国其他十会员国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时首宜充分斟酌联合国各会员国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各宗旨上之贡献……”。

安理会内居然有一名成员公开要求摧毁联合国一个会员国，试问，安理会还有什么道义立场可言？

利比亚代表昨天对安理会说：

“中东的种族主义实体必须摧毁，它总有一天被摧毁的”。（第一八九七次会议，第92页）

可是，会议的记录是，安理会保持了缄默。请问，这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吗？

就拿在这里发言的阿拉伯代表他们的国家来说。看看它们过去的行为，不是对以色列，而是互相之间的行为。想一下它们过去对它们的朋友、对它们的阿拉伯兄弟和对那些在他们困难和需要的时刻给予他们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国家的忠诚。想想它们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如果我没有搞错，阿拉伯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没有一个条约不曾不止一次地违反过。先想想所有这些事情，然后，抚心自问，你们会建议以色列，或建议任何国家，在这些情况下作出让步吗？我知道你们是不会把感情流露出来的，但是，当你们评论这个局势时，你们对理性的忠诚如果不能改变你们发言和投票的态度，至少也能使你们的真正感情平静下来。

我们天天都听到一张邪恶的唱片，哼着充满着固执的仇恨和顽强的敌意的调子，这张唱片因为长期经常使用而破烂不堪，现在，是否到了换另一张唱片，让它唱出希望的声音，甚至是一点善意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天，每一年在这里都从不间断地听到大量的反调和枯燥、漫无目的的谩骂，这些谩骂有时更违反了适用于国际社会的一般礼仪，难道，这不是理性的堕落吗？我们遭受到这种粗暴、侮辱的表演，它的用意何在？借问这就是在我们和我们邻国之间制造善意和更融洽的气氛吗？

所有这些行动，它们的用意是什么？现在难道不是提出问题的时候吗？我已经可以听到回答的花言巧语有如泉水一般地涌过来。我要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不感到困扰，因为，除了我的阿拉伯同事的发言外，没有人可以更好地解释我们的态度或者为我们的态度辩护。事实上，阿拉伯代表在这里的每一次发言都证明了我们的立场正确。可是，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古怪的现象。

主席先生，请问，如果要一个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坐下来听我们天天在这幢建筑物内不得不听的话，这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就是一个设法影响我们走向和解和妥协的最佳办法吗？我们亲眼看到了所有这些可恶的表演，它们的用意是什么呢？这样不停的无聊的谩骂和冷嘲热讽，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只能加强各方面的顽固态度，难道，安理会的成员国现在就不应要求一劳永逸地终止这种情况，坚持冲突各方坐下来本着文明的态度进行讨论和谈判吗？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永远是

一事无成的。为什么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们总是玩弄好胜逞强的无意义游戏，互相比划谁的敌意更深，拼命要表现出他比他的邻国抱有更大的仇恨，而不象文明人一样，坐下来和我讨论问题，不管我们之间的敌意有多大呢？

决议有用吗？它们什么时候起过作用呢？试问，有那一个国际协议是由片的决议促成的，而且，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其中一方连参与都没有，更不要说进行什么协商了。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副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这个问题的总结比任何人都有见地，他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向安理会说：

“你可以提出任何你喜欢的决议。但是，客观现实并不需要决议，它需要可以帮助解决至今尚未解决的重大国际问题的决定。以色列代表正坐在埃及代表的对面。让他们坐在同一个桌上，设法解决安理会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我深信，他们定能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正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有些代表和有些国家坚持己见，不愿意让有关各方直接谈判，企图从中干涉，从而不幸地防碍着谈判的进程。”（第六六四次会议，第95和96段）

我在这里宣布，我现在准备和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每一位大使坐下来，在互相尊重的气氛下举行会谈。让他们先克服跟我谈的困难吧。安理会的辩论，本身就不应用来鼓动仇恨、顽固和煽动，安理会应当采取简单而积极的行动，建议我们，阿拉伯代表和我，至少应坐下来谈。我是随时愿意谈的。

我反对这个论点，认为以色列占领这些领土有碍于和平的进程，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错误前提的论点。它不是主要的问题。假如是的话，为什么一九六七年以前，也就是这些领土还没有落在我们手上以前，也没有和平呢？

我要重复我一再提出的但仍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七年这十九年中，西岸和加沙曾经由两个阿拉伯国家统治。在这些岁月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到底是什么回事呢？为什么阿拉伯国家那个时候不做他们现在要求以色列去做的事情呢？为什么他们不给予西岸和加沙的阿拉伯人以

地方行政的权力，象那些生活在以色列下的阿拉伯人所得到的一样呢？你们统治西岸和加沙已经十九年了。你们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根本没有。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关怀了。

我们争的不是领土的问题，也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问题，虽然这两个问题是重要。我们争的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心理是否有所转变的问题。阿拉伯国家的心理一天不转变，有意义的进展就一天都不可能。

我再说一遍：冲突的核心是，阿拉伯人拒不承认犹太民族有自决的权利和国家的主权。我怎样说也不能把这个问题说得象前大会主席，黎巴嫩的查尔斯·马利克先生所说的这样简单透彻，他在去年接受《星期六评论》的访问时说：

“和平的主要必要条件——其实是和平的精髓——是阿拉伯国家必须接受以色列的存在。〔马利克〕认为，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除非阿拉伯人民的心理有了真正的转变，否则，中东将会受到一次又一次危机的震荡。马利克一再指出“心理的转变”来强调他这个信念，即：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暂时的和解或权宜性的政治手段，而是真心诚意地承认以色列为一个国家。”

阿拉伯民族在我们地区已取得了他们的主权，在纵横450万平方哩的土地上建立了二十个国家，拥有一亿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因此，问题不是世界会不会容许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存在。问题是拥有无比优势、财富和机会的阿拉伯民族什么时候会容忍中东另一个国家也享有起码而平等的权利，在安全和平下求生存。

最后，我要重新强调：如果阿拉伯国家希望和平，它们一定能够得到的。此时此地，我们愿意，而且也一向愿意进行和平的谈判。但是，这里最重要的字是“谈判”。在中东的漫长斗争中，不经过谈判是不可能得出什么结果的。另一方面，每一次谈判都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因此，为什么不鼓励谈判的进程，从而取得一些成果呢？我们不愿意受到别人的支配，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这种支配。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已伸出我们和平之手；我们愿意按照安理会第242(1967)

和第388(1973)号决议所订出的纲领采取行动，争取和平。我再说一遍，我们愿意随时和阿拉伯各国举行谈判，绝不附有任何先决的条件。在这些谈判中，各国可以随便提出它想提出的提案。

我们的谈判，只有在承认以色列主权权利的基础上才会进行。我们的谈判绝不使自身招致灭亡之祸。如果没有具体的和平行动就毅然撤兵，后果便是这样的。如果阿拉伯国家对谈判是认真的话，他们就应该停止我们天天在这幢建筑物内听到的这种讨厌的怨言和谩骂，表现出象一成熟的国家一样。我再次重申，以色列愿意随时同阿拉伯国家开始进行导致和平的谈判，并充分地认识到，谈判的性质本身决定它们必须在互相尊重和迁就的基础上进行。安理会不应再鼓励我们听到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辩论，放弃只能加深各方面顽固态度的决议，转而致力于实现安理会赖以存在的宗旨，实现和平的宗旨。

主席： 下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拉夫先生（约旦）： 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案文是公平和慎重的。它显然是要表明持有各种看法和态度的理事国的共同意见，而不牺牲基本宗旨。它是温和而积极的。

它的基本宗旨是请各方注意现时在以色列占领下各领土的一般情况，此种占领差不多已有十年之久，还不能见到和平结局。

它重申了国际法关于任何占领国对于占领区平民及其居住地的行政原则和规定。

它略微提到——既没有夸张也没有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大部分对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人民的权利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客观地列举这些侵害事件。虽然决议草案基本上没有充分说明实情，却是合时而必需，因为占领区人民，占领国，以及为了联合国威信和良心的保持，都需要它。

占领区居民需要知道世人对他们处境的了解并没有消失，他们符合联合国理想的权利仍然存在，不容剥夺。他们需要明确保证，以色列占领是暂时的，他们脱离占领而独立是合法和必然的。

以色列需要知道，它不是在人类法律之上，它不能免除国际上的责任，它不能仅仅因为它可以引用某种神秘和虚构的特权，能对别人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提醒它们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完全无关的一种犯罪感而迫使它们保持静默，就可以不必承担国际责任。

如果联合国到现在还不能行使有效的政治力量来终止这个占领，同时保护占领下的人民的权利，它就必须采取行动保持它的道义权威。因为正如我在以前说过，约旦河西岸和其余占领区发生的暴动就是向世界发出一个紧急和痛苦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向世界宣告外国占领下的压迫在现代的世界没有存在余地。这个信息也是向世界宣告全世界人民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是不可分的。它也是对侵略者的强大而顺从的支持者提出一个暗示，他们的政策有缺陷，他们的考虑错误，他们缺少

历史意识。以色列说占领区情况正常，未对阿拉伯人进行侵略，情况正常，以色列有意妥协，这些话都不能减轻这个信息的紧急性。

以色列代表给我们讲授了奥韦尔的世界，可是以色列立场的根据绝对不亚于奥韦尔的世界。在奥韦尔的世界中，真话是假话，正义是非正义，事实是非事实。如果我们应用这个标准，我们将发现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及其立场和奥韦尔的世界十分适合。因为如果以色列代表说占领区情况是正常的话，我们就是在奥韦尔的世界中。如果一个国家占领较其本国幅员大三倍的领土，这个领土上居民有一百多万人，而且占领几近十年之久，怎能说情况正常呢？如果占领国正在扩大其正式吞并的地区，较其已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更大出百分之三十，怎能认为情况正常和自然呢？如果人民要求探望他们在占领区的亲戚，监狱长没有否认他们有这个探监的权利，就自夸仁慈和公平，这也是奥韦尔的世界。以色列说占领区经济繁荣，这不能说不是奥韦尔世界，因为占领区经济状况不能和当地将近六十五个以色列居民点一事分开，这些居民点都是在过去九年中建立的。如果以色列对占领区的出口较其从占领区的进口多五倍，怎能说占领区经济繁荣和公平呢？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以色列反对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岂不又是奥韦尔世界吗？这又不是企图把事态完全颠倒吗？如果在占领下的人民起义反抗占领，怎能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或是响应种族仇恨的煽动呢？那一方是种族主义者？一方对不是自己的土地提出要求，以武力和暴行进行侵占，迫使其人民流离失所，把其余人民置于军事占领之下，否认他们的权利，否认世界有权调查或观察这种情况。还有一方起义反抗占领，要求它们的权利，要求世界注意这种情况，对其作出有效的响应，终止占领并在占领期间保护人权。那一方是种族主义者？

如果以色列说，巴勒斯坦人民不是以色列的受害者，而是阿拉伯人的受害者，又说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在阿拉伯世界内行使他们的不可剥夺权利，而不应该反对那些使他们流离失所和此时仍使他们处于占领之下的人，我们也不能接受这个颠倒的事实。

以色列在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前，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不

可剥夺权利是由于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及其暴行而被迫离乡的人的返乡权。当时此事没有实现，而联合国也无法执行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于是造成了以色列代表所提到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十九年的战争。那时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是他们的返乡权。从一九六七年到现在，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个权利是双重的：它仍是返乡权；此外还有行使自决的权利——终止占领。

此事怎会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关呢？怎能把此事说成是阿拉伯方面歪曲事实呢？最后，我们怎能说以色列对于和平解决的立场是公平、合理和愿意妥协，而阿拉伯的立场是倔强和固执呢？究竟是哪一方倔强和固执呢？一方说：“我们要求的只是两件事：此时占领我国土的国家终止占领，其次，该方已使几十万人流离失所，把其余人民置于占领之下，要求该方终止这个反常情况。这样就自然产生和平共存和未来安全有公正和持久保证的局势。”这是倔强和完全固执的一方吗？一方说：“实际上，我的目的在牺牲他方国土以求扩张。自远古以来人民就在那个土地上居住，我在我占领的土地上是正当的”。是不是这一方倔强固执呢？还有一方说：“如果以色列企图牺牲我们的国土来扩张自己，它就不会有安宁，该方向来总是在扩张领土方面谋求安全，该方以牺牲他方扩张自己领土的自取灭亡的方法实行其增加安全的政策。”是不是这一方倔强固执呢？

那一方怎能实现和平呢？以色列怎能希望阿拉伯人答复说：“我们准备同你们讲和，条件包括割让我们的权利、土地、领土和放弃我们的国土”？这一方能够实现和平呢？还是讲下面的话的一方能够实现和平呢？“我们准备讲和，我们准备进行和谈；我们准备接受和平的保证——如果你们终止以暴力造成的非法占领我们的国土，尊重我们同胞的权利，你们把他们逐出了祖居的家园而流落异乡。”

至于以色列代表要求——我不知道是私人的还是官方的——阿拉伯国家大使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事，这纯粹又是企图造成一个奥韦尔的世界。我们不是讨论程序问题，我们是讨论实质问题。我们不是讨论方法；我们是讨论目的，讨论方法和目标。大家不是单纯为了谈谈而坐下来谈，而是为了要达到某种结果而坐下

来谈。这种结果要取决于——以色列代表自己说的——自然正义的概念和国际法的考虑。

阿拉伯方面在一九四九年曾经同以色列方面坐下来谈，就在前不久阿拉伯若干方面也去日内瓦坐下来谈。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以色列政府应该果断地改变思想和态度，必须承认对方的权利。如果以色列决定为了和平撤出占领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在内，那么出席、商谈或谈判等等都不是问题。阿拉伯的若干方面一再说，只要我们能够就方法和最后目的取得协议，实现和平的方法只是次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在显然预断的情况下坐下来谈，那就是由于谈判我们要放弃我们的一部分或全部领土。这就是阿拉伯各方的立场。

在以色列各代表提议和谈的同时，他们坚持说，他们将不回到一九六七年的疆界。谁能调和这两个立场呢？倘如你让步，我愿妥协。如果我和你谈判使你放弃你的权利，我愿和你谈判。如果你和我谈判，我愿和你谈判——你所有的都有谈判余地；我所有的都没有谈判余地。这就是现时的局面。这是一九四八年后引起冲突并且持续了二十年的原因，也是造成了目前的僵局的原因；这也是要求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须要毅然加以解决的僵局。它们只要采取坚决和一致的行动，使这个倔强和固执的当事方接受联合国宪章和自然正义的要求，就能解决这个僵局。

所以，正如安理会面前这个决议草案中所说的一—虽然说得不充分—这是一个简单的并不复杂的问题。因为以色列的继续占领，引起了一触即发的严重的局势。这个占领国因为了改变占领区的自然、文化、人口和宗教特征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和行动，因而使这个严重局势更富有爆炸性。

占领区的心脏和灵魂耶路撒冷直接遭到威胁。该地经过各种改变，面貌已不能辨认，它的占领领土地位不受重视，每天受到这种措施的侵袭，受到以色列在物质上、人口上、行政上和立法上的兼并。

决议草案里要求以色列不可继续实行这种政策和作法，取消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案文中没有一点不是事实或不合理。我们有理由相信安理会全体理事国将一致支持这一温和而明确的案文。这个案文是根据宪章的逻辑，明智的判断以及全体理事国关于这个文件内所提问题的一贯政策的要求。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任何理事国不支持这一明确的原则立场。任何理事国不这样做就是最出乎意料之外，就是对联合国宪章及其道义要求的不尊重，等于是引起在占领下的人民对和平的政治解决途径的失望，并加强他们的强烈抵抗。

在约旦我们和占领区人民的希望和痛苦深有同感。几十年以来，我们和占领区人民都有实际和感情上的联系。我们的战士曾经尽其所能为保护巴勒斯坦的完整并继续防卫使其不受来自西部强暴的扩张主义力量的袭击而流血。在为巴勒斯坦及其人民的战争中，约旦河东岸几乎没有一家没有牺牲它的子弟。

约旦人民和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有共同的命运。耶道撒冷和拉马拉、纳布卢斯和哈利勒，耶利哥和图勒卡尔姆的痛苦声音触动每一个约旦人的心灵。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他们曾竭力使以色列撤出占领区，以便人民行使其自决权。我们要和其余的阿拉伯国家共同努力。我们也希望全世界将同心协力，使一个和平的中东最后从现时的动乱中出现。安理会现时必须采取行动使中东的和平事业跨进一步。全体理事国都应加入这个行动。为了中东的和平这是必要的。为了全世界的和平这也是必要的。为了联合国这一机构的信用这是不可少的。为了表示支持中东和平和人权的每一个理事国的信用这也是不可少的。

主席： 发言人名单上要对决议草案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过言了。

在我们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前，我请要在表决前说明投票理由的代表发言。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今天上午有三四位代表在热烈欢迎我出席安理会的时候所说的话，我要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我并且的确感激他们对我的夸奖。我要顺便提到，这使我想起他们的发言和今天我在安理会外面受到的欢迎恰成对比。就安理会代表来说，我敢说我现在是首开记录，我想这个记录没有人能比

得上，我几乎还没有坐下就有人示威要求免我的职。

第二，我愿意向巴基斯坦代表说，我非常欣赏刚才他平心静气地对我讲的话，并且引述了我在星期二代表我国政府讲的话。我也要平心静气和简短地答复他，并且说明我们的投票理由。

巴基斯坦代表向安理会引述了我在星期二发言时所提出的三个标准，我不必重复。但这就是我国政府用来谨慎衡量的标准，我说“谨慎”，就是谨慎的意思。我们已经按照这些标准谨慎地衡量了在各理事国面前的决议草案，我们断定该决议草案不合乎这些标准，尤其是因为该决议草案反映或含有的意见就整体来说和当地实际情况不符合。举例来说，决议草案的一部分是基于以色列坚持执行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城的宗教特征的政策的看法。我们认为——我国政府和我本人认为——这个结论不正确。正相反，我们认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圣迹的行政措施已经积极地减少了紧张局势。

第三，我认为这一点极端重要安理会各理事国当必记得，其中一项标准就是安理会的行动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和解的进程。我在星期二说，我国政府已经保证将尽其所能谋求解决。在此方面我们不甘落后。正如我当时说过，我们此刻正在努力设法恢复已经取得若干特殊进展的谈判程序，并且平心而论我认为这个努力较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所进行的任何努力已有更大的进展，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们确信并且深感这个决议草案对于和平解决的进程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个决议草案和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就是我在星期二提请安理会注意的三项标准不符合，因此在即将举行表决时美国将投“反对”票。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想说几句话来解释一下，我国代表团将对S/12022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首先应当根据我昨天在这个辩论中所表示的意见来看待我们的投票。我相信我已经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清楚地阐明了我国的立场，因此我认为不需要再讨论问题的实质了。

很明显地，这个决议草案是安理会内不结盟国家的同事们可赞扬的努力结果。他们成功地从原文中删掉了过激的言语，从而使最后的案文更加平衡，他们的努力是值得我们感谢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向所有的提案国致敬。他们这次正如以前一样，显示出谅解和容忍的精神，顾及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许多代表团的立场和意见。

然而，关于以色列当局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做法，我要按照我昨天说过的话来说：当地的居民当然不满意占领并反对占领。这种占领当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但是，在我们看来，有些发言的代表把这些做法称为“希特勒式的暴行”，他们的想象力就未免太过丰富了。我们认为，尽管情况和一些行动都是令人遗憾的，但是以色列在占领领土留下痕迹的同时，却没有背离它自己的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虽然在实际上并不永远是这样，但最少它们的意图是这样。以色列当局在占领领土对当地的阿拉伯人民来说是不幸的，而且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不幸的，但在长期占领后，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由于他们的责任而成为必须的行动。正如今天早上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先生正确地指出那样——我这里只是大约讲他的意思——外国的占领当然引起反抗，而占领时间愈长，反抗就愈大，当地人民的抵抗也就愈大。

最后，按照我昨天所说过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加希望，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也为了以色列本身的利益，尽早消除使军事占领永久化的各种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只能在早日执行第242(1967)号决议内的一切规定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勒孔特先生（法国）：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安理会正在讨论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表达了我在三月二十三日讲话时的关切。

依我们和国际社会看来，目前在占领领土和耶路撒冷的临时情况下，管理国有责任遵守国际法、特别是本组织的各项决议常常提及日内瓦公约来维持现状。一切可能采取的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也不能改变前途。前途只能取决于有关各方为了寻求解决办法而进行的协商；而从阿拉伯占领领土撤出，是这个解决办法的基本因素之一。特别是在占领领土建立移植区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第四条的规定。这对通往解决的道路上又加添了新的障碍，这是错误的。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我们的辩论中已显出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求以色列当局放弃在加沙领土南部建立深水港的想法——正如埃及代表所提到的。

最后，我要向不结盟国家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团致敬，它们再一次为我们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要赞扬它们的努力，特别是它们考虑了我们所提出的意見。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审议的这份案文代表着一种值得赞扬的努力，它抛弃一切武断草率的埋怨来处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决议的各项規定，用坚定但不是争论的口气，呼吁占领国在耶路撒冷和占领领土内采取行动时要遵守原则。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以色列代表团在这里，并听取了它的发言，希望它会把这个决议看作是对明智和理性的迫切呼吁，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这次会议的适当结束。

主席：既然没有别的代表要发言，我认为安理会现在可以对 S/12022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现在我把 S/12022 号文件中由贝宁、圭亚那、巴基斯坦、巴拿马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法国、圭亚那、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四票赞成，一票反对。决议草案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投票后，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来解释利比亚代表团的立场。现在请他发言。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首先，我要简单地回答以色列代表团的指责。我要说的是，在阿拉伯土地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是一个奇怪的实体。由于其本质，它是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我曾经说过，由殖民占领而创立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以色列——只要它是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它就不能在我们当中生存下去。我并没有说犹太人不能在我们当中生存下去。我们接纳所有要居住在我们阿拉伯领土的犹太人，但我们不接纳一个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实体。这个实体不一定要从外面来摧毁，而是由于它的本质，可能从里面来使它摧毁。

其次，由我们的兄弟国家贝宁、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和坦桑尼亚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虽然并不完全符合利比亚代表团的一切要求，但是我们还是投了赞成票。我们这样做，是本着和解的精神，同时也因为提出这份草案的兄弟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试图顾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理事国的意见，让安理会能够对阿拉伯占领领土的严重局势得出决议来结束它的审议。

但是美国投了反对票。斯克兰顿大使举手反对决议草案的照片在大选年中可能是件好事。

我将要谈到美国的投票，因为它是个否决票，所以它是重要的一票。那天我在欢迎斯克兰顿大使时，我说：

“……威廉·斯克兰顿大使带到此间他的正直、高道德水平和政治家风度等美誉。我希望他这位为他伟大国家尽心的公仆对促进他的国家与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和平了解及合作作出贡献。并为了他的国家的真正利益以及为了世界和平和安全来帮助制订美国的政策。我们希望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它的二百周年时为一个新

的光源所指引。 我们向他保证我们的充分合作来达成这些目标，并祝他好运。”  
(第一八九三次会议，第十六页)

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并不真正指望美国当天就会抛弃它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维护政策。 我们知道，变换一位代表或一个作风并不意味着变换一种政策。 在代表着他们各自的国家的不同政策的人之间建立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然很重要。 在我们之间建立一种人情味的和谅解的作风也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政策变得更好和更公平，因为归根到底，不论我们政府的政策是好是坏，我们都是政府及其政策的代表。

我们不能说高兴地看到斯克兰顿大使以一个消极的行动和一个消极的立场来开始他在安理会的工作。 事实上美国的反对票再一次证实和加深了美国的孤立处境和美国对我们阿拉伯人民及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的正义事业所采取的敌对立场。 我们知道，特别在今年这个大选年中，美国的当政集团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的敲诈和宣传的巨大压力。 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也不可以为美国的不公正的和破坏性的政策辩解。

但是我认为，归根到底，美国的否决票是值得欢迎的，是有益的。 因为这一票消除了我们的这个幻觉：以为在作风或人事的改变后，美国的政策就会有可能作出改变，或略微的改善。 事实上，正如我在大会和在安理会都曾经说过那样，美国的否决票证实了美国的当政集团同犹太复国主义的密切关系，特别是美国当局对可能在任何地方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的任何事情十分敏感；它们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维护放在对美国人民本身的利益的维护之前。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大家都还记得，当我们第一次谈到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从本组织中开除出去时，基辛格先生就谈到撤销对联合国的支持。 当时美国新闻界和国会议员争相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往往不是由于他们的信念，而是由于他们害怕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力量。

现在我想把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纽约时报》的一段话列入正式记录。这些话是从一些国会议员的讲话中摘录出来的：

“另一位民主党参议员说，他可以谈到以色列游说团，但只能暗暗地讲，因为他们可以给你选票，而且他们控制着很多竞选的捐款。‘这就是我不能公开发表我的见解的原因，要不然我就没救了。这是一个最强的游说团。’他继续说：‘这个游说团并不对其他问题进行游说来分散自己的力量。很多议员对此都感到不满，但是他们无能为力。这个游说团要把它对以色列的想法强加于国会，它不要国会有任何独立的判断。’另一位国会议员回忆起：‘去年春天，以色列游说团拉了七十六位参议员在支持以色列的请愿书上签名。有很多人说虽然他们并不想签，但是不签的话他们又害怕。有些人告诉我，他们再也不会签这种请愿书了。但假如又有另外一份的话，我敢打赌，他们还是这样怕游说团，还是会再签的。但请不要登我的名字。’”

这就是《纽约时报》所登的国会议员所说的话。

美国的投票证实了这一点。不幸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支持这一政策的人都是美国大学里的杰出人物和知识份子，包括基辛格先生本人在内。我们确信，美国人民有一天将会知道真相，并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花招的本质。假如我提到的知识分子的精华能够客观地和诚挚地谈到第三世界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各种问题，假如这能够使美国人民理解和看到各种有关问题的各个方面，我们相信，美国巨人将会摆脱这些坏作风。我们希望这很快就会实现。

美国一直向以色列提供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来支撑以色列的经济。阿拉伯人曾经遭受过，现在还继续遭受着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同可怕的美国势力的邪恶联盟。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不公正和无限制的支持，是对我们地区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美国当政集团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使得许多美国人觉得

难为情的程度。美国当局对任何可能非难犹太复国主义者实体的发展都是特别敏感的。这些当权人中的一些人把维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看得比维护自己美国人的利益还重要。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张。

由于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无限制支持，造成了美国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及大部分的阿拉伯领袖的敌对恶劣关系。由于这一任务，美国曾经威胁和侮辱了联合国。美国负责当局，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对第三世界国家采用了强烈的语言和强硬的措施。事实上，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都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回复到服从忠顺的屈从地位。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早些时候我在大会里曾经提起过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同美国政府和美国当政集团的问题，而不是同美国人民和国家的问题。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美国人民不再容忍由美国当政集团强加于阿拉伯国家的苦难。我们完全相信，美国人民将会有一天知道事实的真相、理解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和发现美国在中东的灾难性干预的真实面貌。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这个决议草案，性质是温和的，我可以说是非常温和的。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看来表示了一般人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就算是我们不能就最大的限度达成协议，我们起码可以就最小的限度达成连占领了阿拉伯领土差不多九年的以色列也不可能否认的决议。

但是在某一个代表团看来，就算是这样起码的限度都是不成立的，这实在是个令人震惊的迹象，尤其是在我们刚听取过的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中，这个迹象更为令人震惊。他主要是说以色列打算延长它在阿拉伯土地的占领，并打算继续它在阿拉伯占领领土上的罪行。以色列代表在这里说，除了所谓自然法则外，以色列并不打算遵守其他任何东西。但是这种自然法则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即弱肉强食。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就有理由问这个问题了：以色列怎样可以做到宣扬自然法则却又同时遵从弱肉强食的法则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最近常常听到的中

东的公平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不是说的和做的刚好是相反的呢？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先，我要感谢投票赞成决议草案的十四个代表团。这件事本身是一件大事的伟大胜利。美国政府的孤立很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当安理会在三月二十二日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会议时，我们在发言中很清楚地表示了我们对安理会有着很高的期望。我们当时说：

“这个庄严的安理会要负起责任。它必须行使它的权力，行使《联合国宪章》授与它的权力，行使第三十六条和其他各条所说明的权力。现在就要看安理会如何行使其权力以履行其责任了。”（第一八九三次会议，第三十三页）

我们还说这一切起因都是占领，“庄严的安理会应该根据这一点来审议当前的局势”，同时，“补救的办法在于扫除这个起因，即停止占领，越快越好。”（同上）

但是，我们不结盟国家的同事们经过辛辛苦苦的工作后，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产生一个决议草案的任务。在我们看来这个决议草案是连温和也谈不上的，但是在安全理事会我们不能常常达到一切目的。尽管是这样，安理会由于专横的否决而不能通过这个决议草案。但这并不是真正令人惊讶的事：这一否决票是由美国政府投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同一政府否决了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无正当理由地对黎巴嫩发动有预谋攻击的决议草案。在这次袭击中，由美国制造而由犹太复国主义者驾驶的飞机把美国供应的炸弹扔在无辜而和平的平民头上，造成一百个无辜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当时安理会的绝大多数赞成这一决议草案。但是美国的专横否决阻止了这一决议草案的通过。

一九七六年一月，美国政府再次阻止安理会通过一个确认我们有返回自己的家园和在我们的巴勒斯坦家园有独立和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决议草案。但是，正如我当时已经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不管否决也好，不否决也好，不用说，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是固有的，不是由于其他国家或决议承认才有效的。

今天，美国政府再次使用了专横的否决权。但是我们对它不抱任何幻想，因为美国曾经帮助建立和维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和侵略，对仍在继续着的战争、流血、苦难和混乱也有责任，现在依然决心要把在中东和在世界上这种危险的情况永久化。三月二十三日，美国政府代表说：

“最近几年来发生了一系列令我们大家都深感痛心的事，包括恐怖分子的袭击和同样毫无意义的反击和报复。这种和那种事件，其结果都是杀伤人命，而且是杀伤大量人命；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受苦受难。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国际机构里的责任就是当烽火一个个或一堆堆燃烧起来的时候，不要去火上加油，而是要尽可能去消除紧张和顾到事实，并且尽量在那里和在世界其他各处协助恢复和平”。（第一八九六次会议，第三十二页）

他还说：

“只要这种局势持续不变——我重复一次“持续不变”这个词——不论我们怎么感到遗憾，这种紧张状态和间歇性的暴乱都会继续发展下去。”（同上，第三十二页至三十三页）

“回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对耶路撒冷的圣地具有深厚的宗教感情，从而为由于占领状态而来的紧张局势增加了特有的爆炸性因素。（同上，第三十六页）

美国政府代表提出了美国政府用来评价将要审议的草案的三个标准。每个政府自然有它自己的尺度和准则。但是，我们听到美国政府投否决票的原因是由于决议草案内提到“以色列坚持”——“坚持”这个词是出自他的发言的——“其旨在

改变耶路撒冷城的宗教及其他特性的政策。” 这是个很好听的借口，但并没有说服力。

斯克兰顿大使谈到他在安理会内外所受到的不同接待。我们知道曾经有人对美国政府三月二十三日在安理会的讲话进行过诽谤性的歪曲攻击。这是个歪曲的攻击，但也有它的影响。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有美国这次否决呢？在这里，我回想起在这次辩论中已经有人提起过的一段话。邱吉尔先生在反对党时曾经指责在任的首相把世界上最老的议会变成了大家可以方便的地方。美国政府是否也想在大选年把安理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关于被占领下阿拉伯领土的最近这一次辩论所得到的全场一致的结论是，以色列对于这些领土的非法占领必须马上停止。靠武力的军事占领是对于阿拉伯居民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的持续侵犯，也是对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不断违反。

以色列这种占领是特别不人道而残忍的，因为这种占领是企图逐步改变物质环境上、人口上、文化上和宗教上的特性来达到永久侵占现在在其占领下的阿拉伯领土。以色列狂热地向在其占领下的领土移居愈来愈多的居民是明白地证明了它那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本性。因为，他们一方面把土生土长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从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已经住了几百年的阿拉伯领土连根拔起，一方面又竭尽所能从全世界找来几十万犹太人把他们安插在从合法的阿拉伯主人手中侵占和没收来的土地上。

犹太复国主义者企图为一九六七年他们对叙利亚、埃及和当时残存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侵略辩护，声称他们必须保障沿着一九四九年停火线建立的集体农庄的安全。然而，在一九六七年以后，他们又在许多新侵占的领土，特别是沿着一九六七年的新停火线建起新村落来。现在又说如果他们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领土撤退，他们在戈兰、西岸、加沙和西奈的新村落将受威胁，因此又以“安全”做借口，竭力阻挠任何朝向和平解决的努力，坚持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如果我们让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在必须保护目前停火线附近的村落的安全的借口下，可能有一天以色列会再度侵略阿拉伯国家，在最新占领的地区再建起更多村落，为了保护这些新村落再去占领土地，这样这个恶性循环便永无停止的一天。

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是无理的、非法的。这就是这个辩论所肯定的重要的事实。犹太复国主义者亵渎并侵略回教圣地和圣殿只不过是以色列非法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结果的一方面而已。巴勒斯坦及其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居民不能接受外国人在他们的领土上永久占领下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所有国际法和有关人权的法律的原则，他们有权采取任何手段来反对外国的武力占领。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

殖民主义者的占领的正义斗争是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的。

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负起宪章所赋予的责任，设法迅速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非法占领。

刚刚在安全理事会被否决的决议草案，是为了终止因以色列的占领及其对占领区人民的非法压迫措施所加在阿拉伯人民头上的苦难，安理会在现阶段所能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我们原来认为以色列在占领区对阿拉伯人民所犯的罪行，应受更严厉的谴责，因为缺乏坚决果断的态度可能被以色列侵略者看作是国际社会的软弱，或是对以色列的侵略和非法行为的宽恕。不过，我们理解，决议草案的提案人为了使决议草案获得最大可能的支持，从而加强其道义上的重要性和作用，所以接受了很多的，有时甚至是过分的修改。

然而，现在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厅里又有一个人一意孤行，举起反对的手来。看到一个扬言在寻觅中东冲突的公正和平解决的同一个超级大国又一次来破坏和阻挠旨在缓和该地区的紧张，结束该地区居民的痛苦，从而为真正公平而持久的和平铺路的国际间的一致努力，真是莫大的遗憾。

到底决议草案里有些什么东西可能被美国代表用来当作否决的借口，或者当作弃权的借口呢？美国代表自己不是说过，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事一直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状态”吗？（第一八九六次会议，英文本第33至35页。）美国代表在他的发言里不是也肯定过，

“我国政府认为‘以色列’移植区的存在是以色列和其邻邦间寻觅公正而长久的和平解决的谈判成功的一大障碍吗？”（第一八九六次会议，英文本第38至40页。）

刚才美国代表引为他否决的借口和理由的说法是，如果决议草案通过的话，就会妨碍朝向和平的努力。可是在这个会议的早些时候他曾说过，以色列在占领区建立村落正是妨碍和平努力的大障碍。现在他却说，安全理事会要求以色列停止建立这种新的村落会妨碍和平。怎么能说，要求以色列停止，美国代表自己曾经

说是妨碍和平努力的，建立新村落会妨碍和平呢？

美国代表提出了他可以接受决议草案的条件。现在很清楚地看出来，这些条件原是为美国代表否决决议草案而提出来的理由，不论——我再说一遍——在决议草案里用什么样的辞句。

第一个条件，他说，决议草案应该根据，并且符合被占领土的实际情况。如果你再看一看决议草案，你就会发现那的确符合实际情况。决议草案上面说，以色列正在改变占领区的人口、文化、政治和宗教的特性。然而这是美国代表自己说的。

决议草案又说以色列正在占领区建立村落。这也是美国代表自己说的，而且他还说这是不合法的。

决议草案只不过要求以色列停止这些会改变耶路撒冷和占领区的特性和地位的非法行为和非法措施而已。

第二个条件——安理会的行动是不是真的对那些有关地区的管理能有所改进——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了，当然对有关地区的行政管理有所改进，因为那个时候安全理事会将要求占领者停止任何非法行动和任何会妨碍正常行政的行动。可是错用和滥用否决权来阻挠决议草案的通过，对保证或取得适当的行政管理并没什么帮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安理会的行动对和平解决的进程，到底是帮助还是妨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安全理事会全体一致痛责以色列的行动，要求以色列不要建立村落，不要改变占领区的物质环境上、文化上、人口上和政治上的特性，当然以色列就有义务遵守决议——至少这一次有这个义务，因为那将是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全体一致的决议。如果以色列遵守了这个决议，就不会再有新的村落，旧的村落将被拆除，违反耶路撒冷和其他占领区情况的各种法律和措施将被废除。既然，连美国代表在内，认为那些旨在改变占领区特性的所有措施都是解决的阻碍，逻辑上的结论应该是，如果这个决议草案通过的话，它一定能为中

东问题的公正而长久的解决铺路。

然而残酷的事实摆在那里。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已经看到不少次，美国把自己孤立起来，把自己和那被孤立的侵略者以色列孤立在一起。不管那些决议草案是包括旨在该地区建立公正的和平的，或是仅要求侵略者停止侵略，自制不再在占领区造成新的既成事实，美国一再地阻挡了每一个决议草案以后，我们真不知道以后美国怎敢继续假装它是在为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上毫无偏见的作媒人。

至于那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我想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就决议草案举行表决以前听到他讲的，只不过是每一次以色列代表发言时都要重复的一系列司空见惯的谎言而已。我当然不想讨论那些谎言；时间已经不早了。不过我想把我的发言局限在这些谎言中的一两个，来证明，在这次发言里把一些没有根据的话重复了好几次的以色列代表，如果他在重复说这些没有根据的话时说了谎，那么必然地，就和往常一样，和以前几次发言一样，他又是从头到尾在说谎。

他不断地重复说，在一九六七年是以色列受了阿拉伯国家的攻击，他可真选错了话题。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九六七年的战争是以色列的侵略战争，这个事实是连以色列人自己都承认的。已故法国伟大领袖戴高乐将军因为以色列发动了一九六七年的侵略战争而对以色列实行过禁运的事实也是大家所知道的。我想伟大的戴高乐将军和伟大的法国政府一定很明白谁是侵略者，谁发动了侵略的。不过，我要从以色列自己的权威人士口中引用几句：

“为了这头八十分钟我们做了十六年的计划”——指的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向阿拉伯国家的八十分钟攻击。“我们跟这个计划一起生活，我们跟这个计划一起睡，我们吃的就是这个计划。我们不断地使它更完善。”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以色列空军司令的莫德柴·霍德准将的话。一九六七年的侵略计划重复演习了十六年。

拉宾将军，他现在是这位以色列代表所代表的以色列政府的首脑，进一步说过：

“我并不以为纳赛尔真要打。五月十四日他派遣到西奈半岛的两师兵力根

本不够发动向以色列的攻击。他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

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曾指出哪些人挑起并准备了一九六七年的侵略战争：

“最近几个星期……从以色列发出的报告认为，该国有些高级官员的发言太富于威胁性和煽动性，因为这种发言只能使情绪高涨，因而增加对方的紧张。”

(S/7896, 第八段)

可见一九六七年的战争是以色列开始的。以色列为这个战争计划了好多年。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还敢到这儿来说：“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人攻击了我们，以色列只不过是反击而已。”

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重复了好几次的另一个谎话是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来保障和平。他说：“我随时愿意和阿拉伯各大使们见面，和他们坐下来谈判和平。”

谁在阻挡着朝向真正和平的谈判？他说他随时愿意和对方谈判。谁是中东冲突的主要当事国？现在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在以前的辩论里也同意这一点。联合国曾经通过了一些决议确认这个事实。绝大多数的国家都一再肯定中东冲突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结果，巴勒斯坦人民是中东冲突的主要当事人。所以我们不要再听以色列代表那些谎言。

我向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挑战，要他在这个安理会里宣布他随时愿意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也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见面，和他讨论和平。这是以色列代表表明他发言诚恳的唯一证明。

可是各位代表都知道，以色列并不要和平。以色列想侵占它占领下的所有领土。这里所有的代表和全世界各国，都不但知道这件事，并且知道以色列从头开始就阻挡了所有的努力——联合国决议、贤明的非洲领袖们的努力、雅林先生的调停的努力、甚至美国的单边的努力。是什么阻挡了日内瓦会议？就是因为以色列坚持不肯直截了当地讨论真正的问题。这个真正的问题就是由所有当事各方参加，在以色列完全撤出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来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元月里安全理事会进行辩论，当时安理会有个决议草案包括着那两个和平的先决条件——以色列完全撤出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还包括该地区各国都有和平生存的权利。甚至有这样齐全的条件，以色列还是拒绝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那个一直在保护以色列的超级大国还是否决了那个决议草案。

阿拉伯人要和平。他们是诚恳的，因为他们是侵略的受害者。然而他们要正义的和平。他们要和平，可不是跪在占领者的面前求和平。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占领区阿拉伯人民的反抗和起义，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斗争，是永不会停止的，无论以色列仍旧是单独孤立，或是找到了美国来安慰它，都是一样。

主席：埃及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在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今天晚上以色列代表用了安理会的时间——他却说他很想节省时间——耍弄马戏般的诡辩，企图把以色列当局在占领区的不合理行为说成合理。他把许多代表在这个安理会的发言都形容成“谎言”和“虚构”。看来以色列代表对戈贝尔的宣传术颇有研究，一再重复凭空想象的谎言，希望也许有一些脑筋简单的人会相信。

可是这个企图失败了。安理会知道事实情况，不容易坠入以色列宣传方法的陷阱。无论他怎么试，他都无法遮盖在以色列占领区的居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起义。这些起义的民众，就是以色列代表所说很快乐地在以色列占领下享受着所谓以色列式民主的那些人。坐在这个会议桌周围的人都知道一个占领的外国对被压迫民族会带来什么样的民主。

我向各位代表保证，我无意来驳斥以色列代表所说的所有的话。事实上，我并不需要，因为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是自明的。然而，现在借这个机会谈一谈埃及

管理加沙的问题也许很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加沙是依照宪法规定由埃及管理的。这个宪法是为这个领土而制定的。这个宪法特别讲明“加沙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还成立一个十一个人的行政委员会和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

恕我在这儿重复一遍三月二十三日我在安理会所说的话。

“再说，如果以色列代表那么确信他自己所说的，加沙和其他占领区的人民对以色列统治很满意，为什么他的政府要阻止联合国负责调查以色列在占领区的行动的委员会去访问占领区，查明实际情况？如果他那么自信加沙……等地的人民对以色列占领很满意，我要他答应联合国调查团去证实这个情况。人权委员会、红十字会、国际大赦社、教会领袖、名记者，甚至以色列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团体的报告和决定又是怎样说的？如果以色列代表那么有信心，请他邀请这个联合国调查团去。”（第一八九五次会议，英文本第22页）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在安理会表示埃及对于安理会因为美国的否决而未能通过由不结盟国家所提的决议草案，觉得非常遗憾和失望。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耶路撒冷和其他占领区的兄弟姐妹们保证，埃及和他们站在一起，跟以色列的占领和压迫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斗争。历史告诉我们，无论障碍和困难有多大，反抗的人民最后总是要胜利的。违反人民意志的占领是无法长久的，以色列的占领也不能例外。

即使安理会未能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安理会的绝大多数理事国都谴责以色列在占领区的政策和措施，是十分明显的。最后我有一句忠告，同时也是对以色列的警告。就象我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安理会所说：

“如果以色列坚持现在的残酷压迫和压制，那么它将负起中东局势恶化和阻挠和平进程的全部责任。这是逃不掉的事实。”（第一八九三次会议，英文本第47页）

当时我又说：

“……埃及将继续坚决反对以色列在其占领区，特别是在西岸，对我同胞的政策和威胁。”(同上)

很明显的，以色列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不管它想通过压迫措施、开枪、大量逮捕、没收土地、建立新村落等来达成什么——反正这一切总有一天会因被占领区人民的反对和意志而失败的。

下午八时二十五分散会